

第九章 进退之间

1922年夏天以后和192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处于半退休状态之中。此时，我对政局已感悲观，看不到华盛顿会议决议案被立即执行的前景。但我还是非常希望中国能乘华盛顿会议成功之机重新焕发生机，恢复秩序，逐步达到世界民族之林中其应有的地位。

这一时期，我花费大部分时间用于筹备关税会议。当时，我被指定为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委员会分为总务与技术两部。技术部成员皆由财政、交通、农商三部及审计院的资深专家充任。总务部则分为总务与文书两股。

委员会首要任务就是研究我国的流动债务，包括国内外各种公债状况，其时各公债持有者吁请政府尽快用海关增收的税金清理公债。为此需要全面调查各种公债的历史，以辨清各种公债发生的缘由和去向，看其是否用在行政开支或国家建设上。当时尤应注意带有政治色彩的公债，因为此类政治性公债的清理极易引起公众的反对。为此，委员会制定详细表格，开列债务的特征、合同期限内的条款等项。坦率地说，其中并非决无问题，仅就当初公债的动机与目的而言，其利率、代理费和合同偿还责任等内容，无不令人生疑。与外国签定的举债协议的情形也大抵如此。公债极其模糊而粗糙的条款，恰好为整理机构削减还款额提供了充足理由，在无可争辩的情况下，基本上缩减债务总量，几乎是没问题的。

因此,为清理旧债而发行的新债尽量延长了期限,降低了利率。委员会准备了不同的表格,注明更换手续,务使清理工作安全、公平。

海关新增的进口附加税的收入,原拟一部分用于政府行政经费,另一部分抵销各省因废除货物过境税而受到的损失。如何在中央地方两者之间公平分配新增的财政收入,需核查两者的年度财政收入。在具有严格的财会、审计制度的国家里,要取得这一数据易如反掌。然而不幸的是,我国无此条件,历经数月,费尽周折,所取得的数据也不见得细致可靠。根据这些所获数据,还要编成假设的全国预算表。同时,财政整理委员会将研究结果用中英两种文字写成一批专著出版,公开中国财政形势好坏两方面的情况。这里需指出的是,委员会工作本不必如实际存在的那样长久,其没有早日终结的原因在于关税会议一再拖延,直至几年之后方召开。当时列强之中有竭力阻挠者,其中法国坚持要我国首先解决不光彩的金法郎案,不然就不批准华盛顿会议条约,其表现尤为恶劣。

委员会非常幸运地被安排在昔日皇家园囿宫殿中办公。一度在北海团城,该地以所藏玉佛闻名于世,团城上百年老树茂盛葱茏,实为恬静之处。委员会利用此处接待来访的贵客。过了一年多,委员会又迁至南海的瀛台,即1898年,慈禧太后于戊戌政变后囚禁光绪皇帝之所。瀛台地处南海的一座小岛上,为昔日皇家园林的一部分,仅有一木桥可供通行。据说,当年光绪皇帝被困于此时,为防其脱逃,每天夜晚将桥板抽去。

除主持委员会的工作以外,我对政治学会工作也倾注了极大精力。该学会1917年由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博士(Paul S. Reinsch)和中国外交总长陆徵祥先生共同发起建立。我被推举为会长,连任几年。其间,每月集会,演讲者多为著名人士,包括罗

素博士(Bertrand Russell)、杜威教授(Dewey)、顾维钧博士、王宠惠博士等。学会拥有自己的图书馆，藏有数千册关于社会科学与政治学的西文著作。此外，学会还设立会员基金支持学会会刊。基金的部分来源，则出自美国第一期退还的庚子赔款。

我还曾被公推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任职数年。会长由两位副会长协助工作。该会总会在北京有自己的会所，而其中心干事会和一名副会长则常驻口岸城市上海，因为该会尚无固定基金，设在上海有利于筹款募捐工作。如同美国红十字会中心干事会设在纽约一样，上海的干事会或多或少忽视总会，一贯坚持自己运作这个组织。然而，北方的救助工作亦相当繁重，尤其是京畿之区，连年发生内战，红十字会不得不派出召募教会医生及协和医院师生，组成医疗救护队，从事本应属于军医的工作。在当时的中国，军事医疗显然是一空白。

由于某种原因，或是因为其并非土生土长的组织，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发展极其缓慢。在会员人数与社会参与方面，远不如后起的红卍字会。经两会人士商讨，认为红卍字会的成功之处在于宗教精神的引力，而在这方面红十字会比较缺乏。即使后者有宗教精神，也将带有基督教色彩，国人仍会视为异己。我曾有意呈请政府划出流通公债 100 万元，作为红十字会基金，但良愿终未实现。在此期间，该会所获荣誉亦值得一提：美国已故红十字会主席潘恩 (Judge Payne) 当时访问中国，我陪同他参观位于北京西郊的香山慈幼院。他对该院能容纳数百名儿童的房舍与完善的培训系统极为赞赏，对院董事长熊希龄先生说：“您现在所做的事，甚至比您当总理时所做的事更重要。”

这些年来我曾参与并在其中任主席、会长或理事的其他社会

文化团体还有：华洋义赈会（该会在前章已作大致介绍）、燕京大学、平民教育社、北京协和医院、欧美同学会。

出于个人消闲目的，我花费几近一年的时间，翻建了清华大学（我任外交总长时，该校升为大学）附近的一座破败的喇嘛庙^①。我从蒙藏院租来此寺，虽然断壁残垣，但院中古树参天密匝，极富历史韵味。经一番改造整修，装上电灯、电话，配齐房间内的现代设备，建起游泳池和网球场。完工之后，残颓顿失，面貌一新，实为周末休闲娱乐之佳境。寺内残存神像及少数僧人，也出资安顿于其他庙宇。

有一天晚上，我应邀前往富丽堂皇的救世新教会的教堂参加活动达几小时。该教会主持系一年长的清末高级军官，向以谦和有礼、慈善爱人而为人所知。新教会的基本思想是要调合世界五大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教于一身，共同救世。在此教室内，五大宗教膜拜神位一律平等。而事实上，道教的观念与法式最为浓重，突出的一点就是设置了沙盘扶乩。

教堂大厅顶部饰以明亮的七盏电灯，根据北斗星布其方位，令整个大厅充满神秘的气氛。我们同一些教友在小餐厅内共进晚餐，随后，主人出示五大宗教教主同处云端之中的照片，可能是期望过分的缘故，我认为照片不很清晰，与平日所见的画像并无二致。主人向我解释了照片摄制的全过程，似乎是先由教会同仁一齐祈祷，敬请各位教主显容，通过沙盘扶乩得到旨准后，按其旨准的那一天正午前，安置摄影机，朝向云端，教主法驾所过之处，进行拍摄。由此，他们的拍摄获得圆满的成功。

^① 即附属于圆明园的正觉寺。——译者

我被引导登楼去看两处扶乩之处。一处自天花板悬下一类似铅笔的木杆，下面承以沙盘，当祈神示时，木杆开始交叉旋转，在沙盘上画出字来，不过，当晚未见其工作，故不能亲睹表演如何。另一处则在楼上大厅内，坛上木架缀下“神笔”，由两人扶木架两端，迅速移动神笔于沙盘上，每出一字以后，立即将沙抹平，再重复动作，出另一个字。据说扶乩之人完全听从神示被动把握木架，神笔移动也由到访之神直接操纵。沙盘之侧站有两位讲解者，负责解读盘中每次所现字体的含义，常人是不解其义的。解读之辞立刻被坐在讲解者身旁的文书记录下来。当夜所请之神的指示题文，都是深奥的哲学命题。后来我收到此类哲理著作大约6册，事实上，大都是所谓人在神鬼“附身”时写下的东西。

国人为其吸引，前往参观者甚众，就像古希腊人热衷神坛卜筮一样，痴心迷恋，前所未有的。同时也像希腊神谕一样，中国神笔所示答语，亦含糊其辞，一语双关，解读由人或全无答案。不少人因神示而得意。教会主教、执事深知如何取悦于他们的信徒，通过颁发嘉号教名、书法墨宝，甚至奉献法绘等方式吸引善男信女。承赐之前，信徒必须在神坛前顶礼膜拜焚香鸣谢，接受新的神示，方有所获。文人学士也以彼此请神，相和酬答为乐事。

此间玄机神示表演，有时几乎到了滑稽的地步。甚至欧洲的诸神们也“应邀而至”，写下文理不通的英文。一位英国政治家降坛，竟用中文“降谕”，当问及他怎会用中文指示时，他答曰，是由戈登将军(Gordon)附身随译的。然而，据历史记载，这位常胜将军根本不通中文，更不用说书写了。因此，像此类细小的纰漏，不难一语道破。类似的事情，我在吴佩孚将军府上也亲眼目睹过(顺便提一下，吴将军承继军界前辈之权，接管了新教会)。当他1934年隐

退在北京的时候，客厅里居然高悬基督耶稣所赐手书中文匾额，更有奇者，这神书之笔竟还在签名落款之后加上了“学书”一类的谦辞。

灵魂主义似乎尚在幼稚阶段，也许将来可以发展为重要的科学，然而，若跌入幼稚浅薄之中，用命运启示的只言片语使信徒堕入其中，全神贯注，无疑将会助长迷信。类似荒唐的经典事例是清两广总督叶名琛的厄运，近一个世纪以前，就在这位总督扶乩得示广州安全之时，英兵已涌入该城的大门。

由此，我联想到一些著名的军人政客，脱离政界以后，似乎立刻变得倾心宗教，非佛即道，每日花大量时间讲经论道，凝思祈祷。理由因人而异，军阀因其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使生灵涂炭，而政客因其祸国殃民的罪孽深重，两者皆希冀借忏悔求得解脱。也可以说，这样的情形与任何国度或任何时代的某些人出于不同原因，祈求神佑或圣教庇护，没有什么不同。

在北京期间，我曾愉快地与朋友们两度长途旅行。第一次是游历京汉线上的清西陵。这里埋葬着前清数位帝后，包括著名的慈禧太后^①。此处陵寝相对而言比较新，形制规模与环境优美和久已衰落的明十三陵相去无几。然而，参观各陵之后，所获印象，在整体布局与古树茂密方面，远不及北京附近的明十三陵优美。似乎后者的雄伟庄重更让人心动。

参观西陵后，返回京门，继续乘津浦线列车南下，在山东首府济南停一天。旋赴泰安，由此登泰山。一路上，一半步行，一半乘二人肩舆。泰山虽然不高，约六千英尺，但布满名胜古迹，包括

^① 此处似为作者笔误。慈禧太后葬在清东陵，地点在河北遵化县。——译者

孔子弃骑步行登山之处。沿途峭壁悬崖上题刻甚多，且碑趺林立，皆可观摹，行至半山，可以看到许多属于外国传教士的消夏之所。

登临极顶，我们看到了人们熟知的无字碑，那里还有一座小寺用作观光者休息之所，据说，透过该寺窗户可以欣赏日出奇观。因为当日我们就下山回到了专车上，所以，没有机会证实这样的说法。下山之际，轿夫狂奔犹如在石崖陡壁中飞行，令人胆颤心惊。

山脚下的岱庙，雄伟壮阔，以壁画闻名于世。住持向我们展示了一块所谓的温凉玉———端热，另一端冷。有人解释之所以如此，乃是在展示之前，先用热毛巾包裹一端，由于玉导热极差，故这一端虽然热了，但另一端还是凉的。

12年后，一位国际调查团尊贵的团长也来到这里登山旅行，途中休息时，丢失老朋友相赠的珍贵纪念物——手杖，当时苦苦搜索，未能找到。次日，省府出动一大队士兵满山搜寻，终使物归原主。

本次旅行最奇妙之地当属孔夫子、颜夫子故里——曲阜。城不是很大，直径或许不足半英里，但是供奉中国第一圣人的孔庙和圣人后裔的衍圣公府，占据了城内的一半之地。孔庙规模宏大，礼制隆崇，仅次于北京的紫禁城。在大成殿内，我们见到一具铜制棕叶花环，显然出自欧洲制造，系陆徵祥先生所赠。此物若放于别处，肯定会引人瞩目，而放置在这个宏伟殿堂之中，不免让人觉得非常渺小。其后两殿轩辕壮观，为衍圣公夫妇宴息之所，面阔九楹。大成殿前后石级栏柱，雕龙刻凤，生动精致。我们在其他地方没有见过如此精美的艺术，即使北京紫禁城内，亦不例外。

适逢衍圣公不在府中，因而无缘拜会。府中积年藏品遗物甚丰。历代帝王多次追隆孔子谥号，御赐孔氏后裔珍奇宝物，瓷器锦

织、书画典籍等各类珍品，堆积如山，越堆越高，若能清理陈列，必是一藏品充裕的博物院，甚至可以名扬全世界。

我们一行拜谒了孔子墓地。该陵仅为一简朴的土丘，前立墓碑，上书“至圣先师孔子之墓”，碑前有石供案，上面中置石香炉，左右石烛台。

不远处为孔氏族人墓地，呈长方形，四面围墙，一代之坟自成一排，迄今总计已 70 代。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老家族，据可靠的谱系能够追溯到公元前 500 年，而欧洲哈布斯堡王朝虽被公认为古老绵长，也不过只能追溯到纪元后的 800 年，与孔族相比不过是新贵而已。

我们也凭吊了颜庙，走访了《论语》中所提到的、与这位“复圣”有关的各个地方。正殿之前矗立一株巨柏，后来听说遭雷击焚毁。“复圣”直系后人也承袭充国公称号，此人后来北京时，称我为“老兄”，并相赠一幅某朝御赐的精美对联。

我追随徐世昌大总统参政时，他常常不无自豪地提到北方的山西“模范省”和南方的南通“模范县”。庚子事变时，极端顽固排外的满人毓贤任山西巡抚，屠戮不少外国传教士。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山西官军标统阎锡山率部响应，乘机宣告山西独立，寻任都督，后改督军，至今统治山西已 12 年，为各省统治者历任最久者。

久闻其人与其模范政绩，故我决定亲往山西首府太原一行，进行实地考察。访问团由我与外交界同年旧友和两位秘书组成。我们一路由北京出发，先乘京汉线列车至石家庄，改乘正太线窄轨列车到达目的地。抵达太原火车站时，月台上开陈仪仗队，阎将军本人早已迎候于此。遂同乘汽车赴宾馆，司机加足马力奔驰于狭窄

的城市街道之间，同时不断鸣笛示警“止步”，令人精神紧张。汽车速度高达每小时 40 英里，所幸没有出事，这是因为警察早已清理道路，禁止行人车辆往来。

在太原小住之日，我们看到阎将军统治山西以来于建设方面的进步成就。山西本来并非富省，人民生活于偏远之地，很少有机会接触现代艺术与科学知识。教育与其他事业远不如沿海各省发展之快。即如山西大学，实际上也是经人强迫所建，很多毕业生被派往英国继续深造，不少学的都是采矿工程，因为山西煤藏之富冠于中国，所以，急需采矿工程师。事实上，1900 年屠杀外国传教士（多为英国浸礼会教士）之案的解决条件，即是省府当局承诺更积极地推进现代教育，缺乏现代教育正是产生可悲的仇教排外情绪的原因。

另一重要改革与法院建设有关。访问山西之际，正值芝加哥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徐维震先生任山西高等审判厅厅长，通过他的长期努力，该地司法制度全面改观，日趋现代。山西拥有全国最好的司法系统，包括我们参观过的一所模范监狱。省府太原，高小、中学为数不少，此外，还有师范及技术专科学校。总之，太原虽然地不甚广，然世风淳朴，组织管理，井井有条。

我们曾去五台山游览，其地距太原约三天的路程。经省府精心安排，除省长公署派秘书一人充当导游外，又组成随行勤务队，计有中西厨师二人，携带果品酒菜等食物，卫队一路护行。开始时路况良好，汽车送我们直达河边村阎府，见到了将军的父亲。旅程第一夜下榻村中的模范小学。第二天起，改乘骡车或骑马进入山区，夜宿五台县城内。由于地势较高又值深秋十月，颇感寒意。

第三天起，山路变得越来越崎岖，当晚到达五台群峰脚下，寄

宿一大寺之中，寺为一位满人捐资修建，其时地上已积残雪。从山门远望，清晰可见南台顶峰，高耸挺拔，高约10000英尺，形状极似巴黎埃菲尔铁塔。五台山有东、南、西、北、中五峰，高度均在10000至12000英尺之间，形似滚球，40余座寺庙散处其间，其中不少为富丽宏阔之古刹。

我们在圆通寺居留三日，该寺系喇嘛庙，有僧人700余名，殿宇雄伟，铜范小塔无数，为香客提供的禅房亦装饰精美。这里差不多每座寺院都拥有自己的大片土地，由僧众耕种。在圆通寺附近，我们至少看到十几座同样宏伟壮丽的庙宇，一座挨一座，其金碧辉煌并不亚于北京的著名喇嘛庙——雍和宫。因此，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一部卷帙浩繁的大型出版物叙述了五台山诸寺院的历史，这些寺院除了寻常诸神外，对于作为智慧化身的文殊菩萨予以特别供奉。有关这位菩萨的诙谐机智的趣闻难尽其数，他常常变化自己的法身。一次，一位新任县官上任途中，见到一僧与村妇同浴于山溪之中，不免大吃一惊，命护兵射杀僧人，僧人中箭而逃，避入一寺中，护兵尾追进寺搜寻，各处搜查，也未发现罪犯，直至来到正殿，他们才注意到，文殊菩萨神像之侧插着射出的箭矢。

五台山为中国著名的佛教圣地，各地僧徒不远万里来此朝拜进香，特别是来自蒙古和关外东三省的朝拜者最多。入夜，山顶之上可现佛灯，不过只有虔诚信徒才能看见。我们曾碰到一位半着汉装的蒙古人，神情庄重地长途步行进寺朝拜，一边走一边捋发推向空中，任风吹散。如此，他自信可以洗清罪孽。另一山丘上的某庙之中，有一僧自称来自南方，徒步到此，途中每走十步，即对五台山方向，叩头一次。关外居民为五台山各寺院的兴建与整修做出

极大贡献，捐资成千上万。所以，庙宇确实规整宏丽，令人联想起北京的宫廷建筑。

我们很幸运地赶上内蒙章嘉活佛正好驻锡五台山他自己的庙中（庙由袁世凯大总统拨款修建，以促其支持中央）。当我们前去拜会时，他特设宴款待。他的寺庙建于一处山坡上，不仅崭新华丽，而且坚固凝重。宴会纯蒙古式，主菜为烧烤羔羊，拜会结束之际，活佛赠给我们经他祝福过的哈达。游览其寺时，见到凶猛咆哮的蒙古狗栓在木桩上，由于终日被困，所以这些狗的脾气愈来愈坏，夜间被放开，狂吠之声足可使小偷强盗闻之却步。

我与章嘉活佛在北京时常因公务多次相见，偶尔也遇见过他乘黄呢肩舆出入总统府。黄舆象征着权威，尽管被尊为“活佛”，但他日常生活起居的任何一方面，都与普通中年男子并无二样。

我们此行仅登上了南台绝顶，先乘骡车，到达不能行进之地后，弃车骑马。在山巅只发现一石块堆砌的原始石室，而没庙宇。举目四望，群峰浮出云海，宛若大海中的岛屿。我们甚至在山顶附近，竟然看到耕地，穷苦之人依靠这可怜的耕地勉强糊口，由此不禁想起伍廷芳博士的经历，他当年在南美乘火车经安第斯山顶站时，下车观赏风光，见一中国老农正在山上种菜。

由于事前电话通知了沿途村镇公所，因此，返回的路上，均有村民和学校儿童列队摇旗，鸣放鞭炮以示欢迎。我们发现归来途中，借住和用餐过的学校，校舍建造均可谓优良。我们此行的顺利成功，得益于警察系统和电话通信的保障，两者保持了所经之处的秩序井然。

返回太原途中，所过一村正露天演戏，遂驻足观看，该戏就是人们平日所说的山西梆子。该戏以胡琴为主要伴奏乐器，演唱调

门之高，世所罕见。剧中男女角色皆由男演员饰演，男子模仿女声时使用的似乎就是外国听众所谓的假嗓，戏班班主邀我们评出最喜爱之戏，这才被认为是最好的酬谢。然后，班主出现在舞台前，鞠躬大声说道：“敬谢各位老先生指教”（当地的“老先生”意指尊敬的老师，而非老爷，类似于北京的大人之称）。与我同行的同事好友擅长书法，沿途总有人求其墨宝以资纪念，致使当地纸店存货几尽告罄，一时洛阳纸贵。

我任华洋义赈会主席时，曾去归化^①出席年会，归化靠近京绥铁路的终点包头。火车一过南口，通往包头途中的第一重镇就是张家口，为商队往来外蒙库伦必经之地。

下一途经的大站就是山西大同，地处五台山之北。继续前行，始至归化。一路乘车，倍感疲惫，因无卧铺车厢可供使用，8人挤在一个包厢内，通宵蜷坐在那里，还包括几位外国人，整个旅程几乎没能入睡。归化是绥远省首府，气候干燥而寒冷，分为旧城和新城。前者已残破不堪，仅有少数人户，主要为驻防旗兵家眷；而后者繁荣兴旺，政府机构、学校、商店和住户皆建于此。

年会在一座美丽的公园中的政府机关大厅内举行，但是，外来代表则被安排在隶属天主教会的比利时医院内居住。除了召开年会以外，重要的事情就是出席义赈会捐资修建的引黄灌溉水利工程的落成典礼。该明渠引来黄河之水流经归化附近之后，仍归入黄河下游。工程由以工代赈的方式完成，造价甚低，但不幸的是存在着缺陷。渠底坡度不够，水流缓慢，不久即淤积。傅作义将军当时主政绥远，招待来宾友好周到，在我们返回时，特调其专用车厢

^① 归化即今呼和浩特。——译者

供我们一用，车厢之大足够我们每人都有充裕的卧榻之地。

在大同，同行的大部分人参观了由圣公会开办的医院，同时也游览了闻名于世的云岗石窟。石窟中成千上万尊佛像雕刻精美，色彩斑斓，其中不乏高大雄伟之作。令人遗憾的是，该地的岩石种类似乎难于抵御风雨的侵蚀，岁月流失，佛像或多或少已遭腐蚀，失去昔日的清晰的身影。因以前疏于管理，无耻的古董贩子也乘机偷凿佛头盗运倒卖，所以，石窟景观已非全璧。尽管如此，仍保留了原有的风貌和艺术神韵，值得人们一游。

1923年5月，津浦铁路发生的劫车案震惊中外。山东临城^①是津浦线上一个小站，当日，载有几百名中外旅客的一列火车途经此站时，遭匪首孙美瑶部阻拦，孙劫持中外乘客往山寨拘禁，以备勒索。后通过谈判，该伙土匪被收编为地方军，被劫持乘客终获自由。而相应的赔偿则需付给外国受害旅客。

当时我正任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记得在我的办公室会见使团领袖，商讨劫案善后问题时，只见他手中满是有关劫案的材料，所提条件中，有一条要求惩办与劫案相关人员，即查办在保护外国人安全方面失职的山东督军田中玉将军。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因而使谈判陷于僵局。田将军政绩尚佳，颇得民心，而且，还是直系老将。为了打破谈判僵局，政府暗示他自动辞职，但他坚信自己在劫车事件中，没有任何责任问题，所以坚决不辞职。我应外交使团之请，居间劝说田督军以国事为重，担当公职，就必须随时准备为国牺牲个人名誉和利益。此案最终经过各方谅解，圆满解决。

^① 即今山东枣庄薛城。——译者